

民族考古学论集

汪宁生 著

文物出版社



民族考古学论集

汪宁生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9

封面题字：费孝通

封面设计：张希广

213/2721



民族卷古学论著

汪平生著

新华书店发行

新城友联印刷厂印刷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16开 印张，27 插页，9

ISBN 7-5010-0057-3/K·25 10.40元(平)

ISBN 7-5010-0236-3/K·87 定价：14.60元(精)

ESSAYS ON ETHNOARCHAEOLOGY

by
Wang Ning She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ontents

Prefac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Ethnoarchaeology

From Primitive Record-Keeping to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From Primitive Measurements to the Systematics of the Weight and Measures

**The "Large Houses" Discovered 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Yangshao Burial Customs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Some
Remarks on the Theory of "Yangshao Matrilineal Society" and Its
Methodology**

An Attempt at Explaining the Use of Some Stone Implements

Origin of "Eight Diagrams"

A New Explanation on "A Couple of Cultivators"

**King Wu's Army Sings and Dances on its Expedition Against King
Zhou": An Explanation**

On the Character "Subject" (臣)

Origin of "Fire-Changing" Ceremony

**Primitive Fire-making Methods of Minorities in Yunnan and Ancient
Fire-making of China**

Primitive Pottery of the Dai Nationality and Some Studies on Pottery

of Ancient China

The "Long House" of Jino Nationality

The Sheep Scapula Oracle of the Talu People and a Study on the Oracle Bone Custom of Ancient China

The Sheep Scapula Oracle of the Yi and Naxi Nationalities and a Further Study on the Oracle Bone Custom of Ancient China

The Bronze Drums of the Wa Nationality

The Ceremonial Wooden Plates of Naxi Nationality and the "Human Face" Wooden Plates Unearthed From Beacon Sites in Northwest China

The Bronze Drums of Ancient China

The Asymmetric Bronze Hatchet ("Y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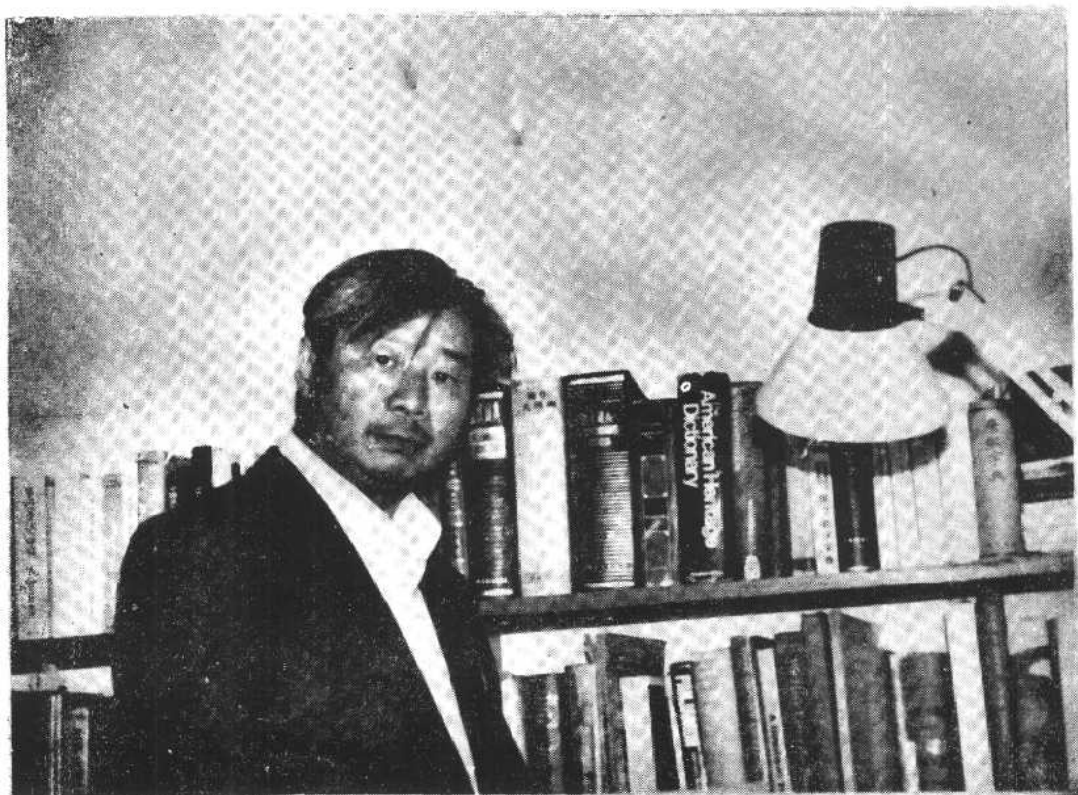
On the Shizhaishan Cul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of Ancient Dian People as Represented on Bronzes Unearthed at Shizhaishan

Ancient Tribes in Yunnan as Represented on Bronzes Unearthed at Shizhaishan

An Attempt at the Deciphering the Pictographs on a Bronze Plate Unearthed at Shizhaishan

Remarks on Bronzes from Yunnan



作者近照

目 录

略谈民族考古学

——代序·····	(1)
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9)
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	(54)
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	(91)
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	
——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	(116)
试释几种石器的用途·····	(132)
八卦起源·····	(145)
耦耕新解·····	(151)
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	(158)
释臣·····	(165)
改火的由来·····	(170)
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	
——兼谈中国古代取火·····	(176)
傣族的原始制陶术	
——兼谈中国远古制陶的几个问题·····	(190)
基诺族的“长房”·····	(211)
云南永胜县他鲁人的羊骨卜	
——附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	(233)
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	
——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	(239)
佤族铜鼓·····	(259)

纳西族的仪式用木牌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人面木牌·····	(272)
试论中国古代铜鼓·····	(277)
试论不对称形铜钺·····	(307)
试论石寨山文化·····	(322)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滇”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343)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象所见古代民族考·····	(372)
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	(390)
云南青铜器丛考·····	(398)
后记·····	(411)
英文提要·····	(413)

略谈民族考古学

——代序

民族考古学 (ethnoarchaeology) 是近年兴起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它萌芽较早^①，但作为一门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边缘学科，是本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的。

近三十年来，欧美出版民族考古学的专书已有十余种，发表论文近百篇，并召开了专题的讨论会^②。民族考古学者通过这些书刊和会议，报道自己田野工作的收获，并就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一些理论问题，展开讨论。现在英国三个大学的考古系设置了民族考古学的课程和学位。由于民族考古学的价值和作用日益为人们所了解，当前世界上有愈来愈多的考古学者投身于民族考古学工作。大家了解到，它不仅可扩大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解释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中一些单凭物质遗存本身不能解释的问题；还可抢救和补充记录过去民族学者很少注意的材料，大大丰富民族志档案；而且通过探讨物质遗存和社会组织、人类行为之间关系之类问题，对人类学本身的理论也有新的刺激和建树。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国内有些书刊把它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这实是一种误会。它是有特定含义的。美国一本最新出版的考古学词典这样写道：

民族考古学，从考古学观点对“活的社会” (living society) 的研究。民族考古学家研究这样社会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考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特别是在物质

①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英国人已以美洲印第安人和古代不列颠的布立吞人 (Briton) 相比较。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人们正是从民族志材料中受到启发，才否定了“雷斧”的传说，首次辨认出石器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和工具。十八世纪一位法国学者以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习俗来印证圣经。美国由于当地就有印第安人，更是经常用民族志材料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如巨冢问题），并以考古调查结合印第安人传说来寻找新的遗址。“民族考古学”一词也是1900年一位美国学者首次使用的。1961年，才第一次出现了专门讨论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论的文章，标志着民族考古学的开始形成。

参见I.Hodder,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y, London: B. T. Batsford, 1982, pp.31—40. D.Stiles, "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Man 12 (1977), pp.87—89.

② 这类会议如1975年在美国圣菲 (Santa Fe) 举行的专题讨论会 (论文集名 Exploration in Ethnoarchaeology 由R.A.Gould 编辑, 新墨西哥大学1978年出版); 197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考古学家的民族志”会议 (论文集名 Ethnography by Archaeologists 由E.Tooker 编辑, 华盛顿1982年出版)。

文化模式和社会其它方面建立起系统的关系……^①

可见民族考古学是要用民族学材料来研究考古学的问题。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虽然谈到具体问题，则还存在一些争论。一派认为，只有考古学者亲自到现代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亲自取得材料来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才算民族考古学^②。另一派主张，民族考古学就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这民族志材料，可以来自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依赖前人的记载^③。前一派可以说是狭义的民族考古学，后一派可以说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故有些学者为前者另起一个名称，称为“活的考古学（living archaeology）”，把它隶属于民族考古学之下^④。

我无疑是赞同后一派的。

按人类学者或民族志工作者，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特殊兴趣，很少记录下对考古学有用的材料（特别如物质文化方面的材料），其它非专业性作者（商人、殖民者、旅行者或牧师）留下民族志记录又多简略而含混。因此，已有的民族志材料，常常不能满足考古学者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确实有必要亲自去民族地区做田野工作，通过自己直接观察，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材料。笔者毕生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至今乐此不疲。

但是，后进民族的变化很快，传统的文化正在不断消失。有些习俗已不见于今日，而前人却可能留下记录，虽仅片语只字，也能给人以很大启发。例如：凉山彝族保存一种类似古代筮法的占卜法，幸赖前人留下简略记录，我们才知道它对研究古代八卦极为有用（参见《八卦起源》）。而且根据我的经验，要解决好考古学上的一个问题，常常需要搜集很多民族的材料来进行类比；而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不可能全靠自己调查。又如研究我国地下出土石器之用途或仰韶文化多人二次合葬这样的问题，国内已没有哪个民族仍然使用石器或实行多人二次合葬，而国外民族在这方面却有保存（参见《试释几种石器的用途》、《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可是这也很难亲去调查。在这些情况下，只能利用前人的记录。把前人记录统统排斥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将是不现实的和不明智的。而且即使是自己作调查，也经常要事先查阅前人的民族志记录，从中取得线索和材料。因此，若把民族考古学规定为必须是考古学者到民族地区作调查，则不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也将排斥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使民族考古学始终局

① R.D.Whitehouse (ed.), *The Fact on File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 New York: Fact on File Inc., 1983, p.166

② M.B.Stanslawski, "The Relationship of Ethnoarchaeology, Traditional and Systems Archaeology", 载 *Ethnoarchaeology*, Edited by C.B.Donnan and C.W. Clewlow, Los Angele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UCLA, 1974, p.18.

③ D.Stiles, "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p.87,

④ R.A.Gould, "Some Current Problems in Ethnoarchaeology", 载 *Ethnoarchaeology*, p.29

限于较小的范围。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随意征引一两条民族志材料用以说明考古学问题，就是民族考古学，因为在一般考古学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引证。但我们认为，任何人（不仅仅是考古学者）只要有目的有计划地系统搜集民族志材料（不管来自自己的调查还是前人的记录）来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经过严格的验证后用以解决考古学问题者，都可算民族考古学。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我们今天要提倡的也正是这种广义的民族考古学。

按民族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对中国人并不陌生。我国在这方面是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先进地区已经消失的事物，在边疆偏僻地区可能还有保存。如孔子欲去“九夷”地区，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①。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②。就是因为边远和海外地区犹保存孔子所向往的往昔的制度。孔子还从熟悉古代以鸟名官制度的郯子学习，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③。又传说孔子在陈发现带箭的隼，立即辨认出那种以柁木为杆以石为镞的箭，是“肃慎氏之矢”。武王分赠贵族的贡品中即有此物^④。用今天的话说，这是用民族文物和古代文物相印证。我国古代许多学问都被托始于孔子，故以上是否全为孔子所说之话和实有之事，自无法肯定。但至少在孔子的时代，我国已有这种以今例古的思想。后来把这种思想归结为“礼失而求诸野”^⑤，或“中国失礼，求之四夷”^⑥，并以此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学者常用此法考证古代名物制度，如郑玄之注三《礼》，杜预之注《左传》，即曾引边裔民族习俗为例证；而记述边疆少数民族习俗的著作，又常联系古代制度，慨叹“古道犹存”^⑦。

这一做学问的方法自古至今延绵不绝。五四时期新学术的倡导者、首先把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的蔡元培先生，即曾以国外民族原始记事方法和原始取火方法来说明中国古代“结绳记事”和“钻木取火”实有其事。他还第一次指出考古材料有待“用民族学来证明，才能知道详细的作用”^⑧。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著有《浪口村随笔》及由此改写而成的《史林杂识》，专用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印证古代习俗和名物制度，而且所用材料大部分得自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可算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最早专著。民族学

① 《论语·子罕》。

② 《论语·公冶长》。

③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④ 《国语·鲁语》下。

⑤ 《汉书·艺文志》。

⑥ 《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

⑦ 刘敦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解》，《民族学报》1982年第2期。

⑧ 蔡元培：《说民族学》，《一般》杂志1926年2月号。

家凌纯声先生关于古代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文化史的一系列论著中^①，也有不少可称为民族考古学之作。他研究每一问题，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社稷、宗庙、陵寝制度或玉石礼器的考证，还是探讨造纸、海船之起源或各种特殊葬俗之分布，总是从各个方面搜集有关资料，加以综合研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资料中既包括考古材料，也包括民族志材料，还有大量中国古文献资料。考古学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但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文字记录，历史文献极为丰富；在中国，民族考古学和整个考古学一样，是离不开文献的。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一个特点。凌纯声先生正是由于不斤斤计较于各学科的研究范围，一切以解决问题为旨归^②，才使他许多论著达到很高的水平。很多前辈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或古史时，均曾采取以今例古的方法，作出很好的成绩，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建国以后，一些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继续注意到民族学和考古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一再强调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③。在前辈学者启发之下，我国有一些受到过考古学训练的或对古代文化有兴趣的学者先后走向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或搜集民族文物，并常联系考古学问题进行研究。尽管没有使用“民族考古学”这一名称，而大家所做的正是民族考古学的工作。

笔者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即将出版的《民族考古学论集》便是二十多年来个人探索路途留下的足印。个人在探索过程中，曾不断注意改善工作的方法，现藉此机会，谈谈个人对民族考古学方法论的若干体会。

民族考古学的方法，一是田野工作方法，二是研究方法。关于前者，虽然已有学者在积累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民族考古学调查的一些特点^④；而其基本方法，如：如何选点？如何交朋友？如何选择报告人（informant）？如何交谈？如何记录等等，与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方法并无不同，可以无须细说。这里只谈后者。

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类比。类比（Analogy）是哲学上或者说是逻辑学上的概念，即从已知事物辨识同类的未知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其前提是两种现象在一个方面相似或相同，在其它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例如，出土石器若和原始民族所用石器外形相同，即可能具有相同的用途。由于仅仅是可能，不适当地应用类比，便会导

① 有关目录，参见李亦园：《凌纯声先生对中国民族学之贡献》，《民族学所集刊》29，1960年。

② 见张光直为凌纯声《美国东南和中国华东丘墩文化》一书（台北，南港，1968年）写的序言。

③ 见费孝通：《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考古通讯》1956年3期。林耀华：《什么是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夏鼐也有同样看法（见《考古学通论讲义》）。他在1983年1月10日给笔者的信中写道：“利用民族材料以研究考古学上问题，为一很有前途的途径”。

④ Present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s, pp.41—46.

M.Schiffen, "Methodological Issue in Ethnoarchaeology", 载Exploration in Ethnoarchaeology pp.234—238.

致错误。只有依靠一套科学的方法，才可以避免错误或把错误缩小到最低限度。故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恰当地选用民族志材料来和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的问题。

一 选择什么样的民族志材料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称为“直接的历史方法”(Direct Historic Approach)，认为对考古材料之复原只能以同一地区的民族志材料来类比。另一种称为“普遍比较”，即认为可从大量民族志材料中归纳出一些带普遍性的模式，供复原考古材料时类比之用^①。这些民族志材料当然不限于同一地区。

前者虽较可靠且有说服力，但只能用于今天仍有大量后进民族分布的地区(美洲、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岛屿等)，对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是不适用的。故当今大多数民族考古学者主张“普遍比较”的类比，并致力于改善这方面的方法。

对中国的民族考古学来说，也只能采取普遍类比的方法。例如，要研究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问题，若只许用本地区民族志材料来进行类比，将无法进行，因为中原地区早不存在原始民族可供类比。

普遍类比之可行的理论依据，就在于人类文化有差异性，也有共性；而且愈是原始的文化，这种共性愈加显著。在两种素无接触的民族之间，可以找到相同的或相似的工具、习俗乃至思维方法。这恐是大家共同的体会，任何一个曾广泛接触后进民族的人类学工作者，都能举出自己的例证来。

当然，普遍类比也并非没有限度的。已有学者提出类比要具备的条件，即选择民族志材料时要考虑到：(1)文化连续性；(2)自然环境可以比较；(3)文化背景可以比较^②。

从原则上看，这种有条件的类比无疑是合理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困难很多。特别是研究中国民族考古学，尤为如此。以文化连续性来说，在中国，大概只有西藏或云南边疆几个少数民族，可以认为从史前到今天具有一定的文化连续性。以自然环境来说，中国文明孕育于气候温和的黄土地带，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同样的黄土地带而今天仍居住着后进民族可供调查的地方。关于文化背景，这确是应该考虑的。如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民族来印证旧石器文化，以经营早期农业的民族来印证新石器文化。但对此不能绝对化。一种习俗可以残存于后世，如早期农业民族定期集体狩猎的仪式，同

① K.C.Chang, "Major Aspect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8 : 3 (1967).

② R.J.Sharer和W.Ashmore, *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 Menlo Park, The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p.463-464.

样可以印证考古学上所见的狩猎文化。

从中国实际出发，我在如何选择民族志材料方面，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先近后远”的原则。例如，研究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某一问题，首先从国内比较原始的少数民族中寻找类比材料；如不可得，再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甚至美洲印第安人寻找；如仍不可得，则其它地区民族志材料只要可供类比者也可考虑使用。这是因为从民族来源及亲疏关系来说，华夏民族首先和国内民族关系密切，其次和太平洋周围地区民族应该说也有一定历史渊源。如众所知，太平洋地区玻利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甚至南北美洲印第安人正是从亚洲大陆陆续迁去的；尽管分居于不同地理环境之后形成不同文化，但由于曾有历史渊源而保存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是可能的。更主要的是无论什么民族志材料，只不过给予人们以启发和灵感，帮助建立起一种假说，至于这假说能否成立，还有待验证，即最终要看考古材料本身是否存在足够的根据（详后）。民族志材料本身并不是决定因素。

在搜集民族志材料时，无论是亲自调查还是参考前人记录，应尽量选择那些比较完整保持传统文化的民族。若一个民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已发生变化，则应尽量选择那些变化较小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并区分哪些事物是固有的，哪些事物是次生的或外来的。这一点和从事一般人类学调查工作并无不同，无须赘述。

二 研究的范围和问题

我们赞同民族考古学要解决的重点是史前考古学上的问题^①。对研究历史考古学来说，由于有了文献资料，民族考古学和整个考古学一样，其作用已相对减弱。当然对于远古的或古代社会中的一些难题，有时还需借助于民族考古学来解决。但我们决不同意把它的研究范围无限延伸下去，甚至认为研究近代工业社会也可使用民族考古学。

我们还认为研究史前或古代社会，类比材料只能从前资本主义（或前工业社会）的民族中取得。尽管我们不赞成在选择民族志材料有过多的限制，但这一界限是不能逾越的。因为近代工业社会由于物质生产的革命而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方式各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史前的或古代的社会是完全无法类比的。有人观察西方当代城市中儿童玩弄垃圾的情况，用以类比远古遗址堆积之形成与分散；通过五六十年代的“嬉皮士”（Hippies）到八十年代“庞克士”（Punks）奇装异服的迅速改变，说明考古学遗物风格之变化；我们实在无法苟同。

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史前社会或古代社会时，可研究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我国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只局限于制陶、葬俗等有限的几个问题，思路过于狭窄。当代民族考古学

^① D.H.Thomas, *Archae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p.398.

所探讨的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方面。除物质文化本身外，还注意到居住模式、土地利用、生活来源、生态、人口估计，甚至政治组织等问题^①。我们今后不妨多选一些课题，探讨新的道路。

三 如何进行类比

民族考古学者可以做完田野工作后公布材料，或仅仅笼统提出几点规律性现象供研究古代遗存之参考。例如，研究原始民族制陶（这是一个最常见的民族考古学课题），只需从制坯技术、烧制技术、陶器风格、交换和贸易乃至陶片堆积的形成各个方面进行报道，并指出对研究地下出土陶器有哪些启发，即可完事^②。但也可以联系某一地区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行讨论。我们倾向于后一种做法。例如：调查傣族制陶后，便可以此为类比材料，探讨内地出土陶器的一些问题（参见《傣族的原始制陶术》）。

正是在联系具体考古材料方面，不适当的类比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为了避免错误，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方法，按一定的程序办事。

我通过多年的摸索，为自己规定的程序是：提出问题或对旧说进行否定——通过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以建立假说——从考古材料本身寻求证据以验证假说^③。多年来我所讨论的大小问题虽不能说都经过这样的程序，但自己是力求按此办事的。1983年我才开始接触欧美民族考古学的书刊，发现他们也强调验证（如L.R.Binford之研究北美密西西比河地区之烟熏毛皮洞穴）^④，而且也提出类比——形成假说——验证假说的程序^⑤，与我们的并无差异。当然，以上这套程序是说明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时必经之途径，并非是每篇文章都要按此顺序而写。

一次成功的类比的关键就在验证（testing）。如研究某种出土器物之用途，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类比提出一种假定的解释，这时必须设想假如出土器物确是作此用途，在

① C. Kramer (ed.), *Ethnoarchaeology: Im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for Archae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

② N. David and H. Hennig, *The Ethnography of Pottery: a Fulani Case Seen i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Addison-Mesley Module 27 (1972).
W. Longacne, *Kalinga Pottery: 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 载 *Pattern of the Past*, Edited by I. Hodder and Others, 1981.

③ 笔者在哈佛、斯坦福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洛杉矶）等大学的演说稿：“Using the Assistance of Ethnographic Material to Study Ancient China”。

④ L. R. Binford, “Smudge Pits and Hide Smoking: The Use of Analogy in Archaeological Reasoning”, *American Antiquity* 32 (1967).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Use of Ethnographic Data”, 载 *Man the Hunter*, Edited by Lee and DeVore, Chicago, 1968.

⑤ D. Stile, “Ethnoarchaeology, A Discussion of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pp. 94—95.

器物本身应该有什么表现（如留下哪些痕迹？在制作材料上有何要求？出土数量等等），在器物和周围关系方面又应有什么反映（如和哪些器物共生？发现地点？等等）。然后，仔细察看这器物，看是否符合你的设想。如符合，则假说可以成立；如不符合，则假说必须放弃，再寻求另外的解释。

通过验证以建立一种学说或解释，在我国有优良传统。先秦时期思想家韩非即已提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①事实上，研究一切学问，都应经验证的过程。只是民族考古学更需要验证而已，否则在复原过去时易导致虚假的结果^②。

通过类比——假说——验证，可能建立一种新说，也可能仅仅否定以前的误说，并不能提出新的解释（如拙文《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这种工作，在民族考古学上被称为“破坏者”，或者说是“刺入气球的一根别针”^③。用我国俗语来说，就是“破而不立”。这当然是不够的，但它可为今后正确解释的产生扫清道路。

通过类比——假说——验证，也可能只解决某个问题之中的一部分，而未能全作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中的“多闻阙疑”^④，而不可强作解人前人在研究古文字学时，常用一种存疑的办法，即“但取其可解者著之，而尽阙其不可解者”，并认为“他学无在而不可用”^⑤。在民族考古学中，这种办法确是非常用不可的。

以上对民族考古学，特别是结合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对它的定义、历史、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谈了自己的见解。限于篇幅，未能多举例证。不当之处，请大家不吝指教。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

① 《韩非子·显学》。

② R.A.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9.

③ J.Yelle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Present Models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④ 《论语·为政》。

⑤ 王国维：《容庚《金文编》序》。